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窦怀永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卷之三



敦煌讲座书系

窦怀永 著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 窦怀永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86-6

I. ①敦… II. ①窦… III. ①敦煌学－文献－禁忌语
－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198号

出版人：吉西平
策划：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白 鑫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赵 鹏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窦怀永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253 千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23-2386-6 定价：38.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做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凡 例

一、材料来源与编号

本书所论“敦煌文献”指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中国古代避讳以汉语、汉字为载体，故非汉文文献，不列入考察范围。

书中所引用的敦煌文献材料，一般据《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所收影印本。

写卷编号均沿用学界通行称法，“北”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S.”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编号，“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aul Pelliot）编号，“Дх.”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编号，“Ф.”指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弗鲁格编号，“上图”“上博”分别指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北大”指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编号，“浙敦”指《浙藏敦煌文献》中收录的浙江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敦煌文献编号，“津艺”指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教研”“酒博”“甘图”“西北师大”“永博”“中医学院”“张博”“甘博”

“敦博”“定博”“高博”分别为《甘肃藏敦煌文献》中收录的敦煌研究院、酒泉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甘肃中医学院、张掖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定西县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等单位所藏敦煌文献编号，“散”指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散录》旧编号。

二、符号使用说明

引用敦煌文献时，全部标明卷号。如 S.5319、北 8452（珍 020）。对于包含有几部分内容的文献，则各部分用 A、B、C……来表示，如 P.3101B。如果文献后还附有碎片，则以 p₁、p₂、p₃……来表示（p 为 piece 的缩写），如 P.2915p2。卷背文书，则在编号后加 V（英文 Verso 的第一个字母）。对于部分可以缀合的写卷，则用“+”表示前后连接，而基本不区分具体位置的上或下，如 Φ.256+Д x.485+Д x.1349。

引录敦煌文献时，缺字用“□”符号表示，缺几个字用几个“□”。原卷本身有脱漏的，用“[□]”符号表示；所脱之字根据上下文、文义或他本补出时，置于“[]”中。原卷模糊不清无法辨识者用“■”符号表示，缺几个字用几个“■”。原卷残缺字数不能确定者，用“——”符号表示上部残缺，“——”符号表示中部残缺，“——”符号表示下部残缺。原卷使用重文号而需要特别说明时，一般用符号“々”表示。

引用其他文献材料时，一般在引文后以脚注方式标注所自文献的名称、卷数、出版信息、页码等；脚注号码以带圈数字排列，每页重新编号。当页第一次出注时标明书名、出版信息等情况后，再引用时只标明书名、页码。如标：“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 页。”当页再次引用该书时，仅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第 268 页。”

三、标点与文字

敦煌文献和传世古籍没有标点符号，故引用时以现行标点符号点读。对于民国时期和港台地区论著中标点符号与大陆标准不相符合的地方，为阅读方便起见，一般根据大陆现行标准改正。

书中各章节除需要特别分析或说明的俗字、异体字外，均使用通行规范汉字。为便于表述，帝王名讳用字在涉及字形分析、字形比较等情况下，一般使用繁体字形。

四、恭敬称谓

本文多处引用了前修时彦的研究成果，为求行文简洁，一般不赘“先生”字样（直接引文或书名中本来敬称“先生”者除外），敬请谅解。

目 录



凡例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宋代以前避讳概观	3
第二节 古代避讳研究概况	16
第三节 敦煌文献避讳研究回顾	27
第二章 敦煌文献避讳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49
第一节 敦煌文献避讳的主要特点	51
第二节 敦煌文献避讳的影响因素	106
第三章 敦煌文献避讳的方法	127
第一节 缺笔避讳	129
第二节 改字避讳	143
第三节 改形避讳	156
第四节 敦煌文献避讳方法实际应用统计	172

第四章 敦煌文献避讳字形的探讨	177
第一节 避讳字与俗字的关系	179
第二节 敦煌文献俗字避讳现象	200
第三节 敦煌文献避讳字形举隅	219
第五章 敦煌文献避讳与断代	251
第一节 敦煌文献断代的重要意义	253
第二节 敦煌文献避讳断代的原则	255
余论	285
参考文献	287



第一章

绪 论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在伴随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进程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从史料来看，避讳现象至迟在周朝就已经出现，并随着国家的产生与政权的建立，逐渐被赋予神圣的外衣，成为彰显帝王尊贵形象、维护帝王无上权威的重要工具之一，对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古代典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以前避讳概观

从有明确纪年的写卷来看，敦煌文献在时间上跨越了 600 多年，经历了十多个朝代。题记最早的是上博 01《佛说维摩诘经卷上》，抄写于麟嘉五年（393）；而最晚的是Φ.32《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氏汜氏捐经题记》，抄写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因而，在具体讨论敦煌文献避讳特点及相关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宋以前中国古代避讳的发展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交代。

一、“避讳”的内涵与外延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避讳”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

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①

“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是说多次称赞燕王等以使皇上产生怀疑，而对吕不韦、霍去病却回避而不加称誉。因此，这时的“避讳”一词还只是“回避”的意思，这在《淮南子·要略》《论衡·佚文篇》等文献里也有反映。当时，还出现了“讳避”一词，含义与“避讳”基本相同，例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文曰：

《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荀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②

汉代以后，“讳避”与“避讳”一起作为“回避”意，并行流通使用。而大约到了两晋时期，“避讳”一词开始用来指称规避帝王名字。唐杜佑《通典·礼六四·沿革六四》载：

束皙《不得避讳议》云：“元康七年诏书称，咸宁元年诏下尊讳，风伯雨师，皆为诂训。又公官文书吏人上事，称引经书者，复多回避，使大义不明。诸经传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称号，皆不得变易本文，但省事言语，临时训避而已。”

太常博士华简言：“按《周礼·大宗伯职》云：‘櫝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此礼文正称，应如丙辰诏书，不改其名。”事

^① (汉)班固《汉书》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0页。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2—83页。

下五府博议。贼曹属束晳议：“按风伯之名，所由来远，其在汉魏，固已有之，非晋氏避讳始造此号也。若以异于《周礼》，宜当变改，则今国家行事，神物称号，多因近代，不皆率古，盖亦简易以从仍旧，随时之制，不足悉变。唯雨师之名，实由避讳，宜如旧称。”^①

如果《通典》所征引的束晳奏议确属原文的话，那么两晋时期的“避讳”已经在“回避”意的基础上明确分出“回避帝王名字”的含义。“讳避”一词也逐渐产生出这个含义，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即载：“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殊遇反，然皆讳避，则以为一字也。”^②

随着避讳风气的不断浓郁和避讳制度的不断发展，“避讳”一词“回避帝王名字”的含义在后代逐渐专有化，一直沿用至今，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问题。1928年，陈垣发表《史讳举例》^③，首次从史学的角度对“避讳”进行了定义，并提出了避讳学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避讳在本质上来源于原始禁忌，因而“避讳”也成为现代修辞学辞格的一种，指“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④。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即明确将“避讳”列为“积极修辞”，并解释说：“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该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做避讳辞格。”^⑤

可见，“避讳”在发展中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本书

^① (唐)杜佑《通典》卷一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27页。

^②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页。

^③ 《史讳举例》共八卷，首刊于1928年《燕京学报》第4期。可参看本书第25页。

^④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0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1277页。

^⑤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要讨论的“避讳”是指“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①的现象，而非隶属于民俗学的回避、禁忌义“避讳”以及属于语言学的修辞格“避讳”。

二、宋代以前避讳概观

(一) 先秦时期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避讳”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避讳事实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发生^②。《尚书·金縢》有这样一段记载：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③

武王姬发因为生病，所以周公旦设坛为他祈祷。在念出被祈祷者的名字时，周公旦没有直呼武王名字，而是改用了“某”字代替。孔安国传

^① 陈垣《史讳举例》之“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 关于避讳的起始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从夏至秦，各有所凭，莫衷一是。此处仅根据《尚书》的记载定出下限。各家观点可参阅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之《学者论避讳在中国的发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③ 《尚书正义》卷一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页。